

徐迟报告文学

徐迟谈报告文学

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习作教研组

一九七八年八月

目 录

徐迟谈报告文学.....	(1)
--------------	-----

——在国内记者业务训练班的报告

附:

地质之光.....	(32)
-----------	------

哥德巴赫猜想.....	(54)
-------------	------

在湍流的涡旋中.....	(84)
--------------	------

生命之树常绿.....	(96)
-------------	------

徐迟同志在国内 记者业务训练班的报告

(记录稿，未经本人审阅)

国会街二十六号，是旧游之地，新华社有我许多老朋友。原来我在这个院子里工作，上班有三年多，现在回到这个地方来，也是有很多回忆呀，很多联想。李普同志打电话约我来谈，我就答应了。有很多老朋友还在，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忘记。可是一看整个都变了，好多年没有来了，好多都变了。（李普：变得乱七八糟了。）清朝时候，这里是养大象的院子，有很多人不知道啦；北洋军阀时议员们用热水瓶打仗，搞武斗的地方。这都过去了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

跟李普同志约好了，这次讲话不作任何准备，想到哪讲到哪。先讲一下报告文学，一般的报告文学，报告文学的一般和写科学的报告文学，这里当然要讲到一般文学的问题，讲到一般的文学和特殊的文学，特殊的文学就是报告文学。今天大概讲这么几个小题目，一个是思想，一个是生活，一个是语言，一个是构思，一个是细节，还想稍稍讲讲造句。原来在人民日报讲过一次，前面五个讲了，造句没有讲，今天

索性讲讲自己是怎么造句的。

—

这个思想呢，还是统帅的，文章的统帅。我写了很多，写了差不多四十五年。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是一九三三年，到今年四十五年了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思想的问题，思想性的问题，是没有解决的，可以说是摸索了四十五年，总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一个作品不单是要有思想性，而且这个作品应该和当前的政治任务、中心的政治任务相结合。过去，郭小川同志曾经规劝般地对我说：你呀，文章有时候写得蛮漂亮，但是你总不能够扣响、敲响亿万人民的心弦。而我们的诗人是应该这样的，就是要扣响亿万人民的心弦。那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，北京敲锣打鼓，庆祝工商业的改造，在这个时候讲的这个话。我也时常琢磨，我起先觉得要做到这一点不大可能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你要说出话来使大家的心弦都给你拨动，我从来就没有敢想写这样的东西。小川同志有许多作品是作到了的。我追求漂亮的文章，总想写得很漂亮，追求这个有几十年，曾产生一个想法：我只能写这样一些作品，搞写作的同志喜欢，一般群众是不会喜欢的。文化大革命以前情况就是这样。

现在我回想过去，写了多少年，著作目录是相当多的，但是没有力量，缺少一种力量，大概主要是思想，思想性不过关。后来稍稍有些改进了，有进步是由于文化大革命。我写陈景润的文章，最后一段写的“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他不可能写出如此成熟的论文。”写这个话的时候，实际上

是写我自己，不过陈景润是完全同意的，他认为我这样写是对的。这次科学大会报告里头，他是要讲这句话的，我已经看了他的发言稿了。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陈景润是不可能写出这样成熟的论文来的，我也是不可能写出《哥德巴赫猜想》这样的文章来的。我现在想来想去，最根本的还是在思想性这方面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自己有了一点微小的进步。

文章总是要站得住，它的脊骨应当是思想性。我讲讲自己的情况：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过去是读的，很早，二十五岁后就比较自觉地读了。很多年不断地学，总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，简直弄不清楚了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过去有这么个习惯，运动一来，有的人要受到一些批判，我大体上没有什么事情，也不做什么工作，运动开始后就读书了。尽管读了不少，可是总是对我这个人不起多大作用。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按照习惯，运动来了，我就读书。可是读不到什么东西，而且越来越心慌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后来就靠边站了，靠边站就关在一间楼上。那么，下雨也不用打伞，也不用套鞋，反正就在这个屋子里头。就想尽一切办法搞书，还是搞到了不少书。不过，不管怎么读，对自己作用还是不怎么大，留不住，记不牢。一直到“九·一三”林彪摔死，我这才开点窍，从内心里感到参加路线斗争了。然后读书开始好一点，但说不出所以然来，就是读起来感到顺当一点了。以后就读《马恩选集》，读完了。七三年大年初一开始读《列宁选集》，通读，半年里读了一遍，然后就反复读。毛主席著作是一直读的。凡是毛主席在开国后发表的文章，我都有手抄的。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的大量的毛

主席著作，没有几个是经过主席订正的，能够见到的我就抄，都抄了。稍稍开窍能够懂一点了，可是所以然还是说不清楚。“九·一三”事件以后，七三、七四、七五年，主要是读书，除了读经典著作之外，还读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还有管子。我专门搞管子，“四人帮”搞所谓研究儒法斗争时，我就读管子。那时候管子是很冷落的，没有人管他的。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充分的时间不断地读，到后来工作了，也还是读书。那时虽然工作，但也不写文章，发表了没有什么好处。你一发表，就说你这个老家伙又冒出来了。也不想发表，还是读书。另外，出去跑一跑。

《地质之光》发表以后，我们湖北就有人说，徐迟这个人赶浪头赶得不错。我刚才讲不仅要有思想性，而且要和当前的政治路线相结合的那样一种思想性。这次也是碰巧，并不是充分意识到的。现在回过头看看，写这个文章在思想性上比我过去的文章进步了些。《人民文学》打了个长途电话问我：你愿意不愿意写李四光？那时候是“又红又专的李四光”的评价已经见报了。平素也读过一点李四光的著作，对他的著作是比较佩服的。读的当然不多。当时我就答应了，以后在看李四光的著作时，很突出的就是感觉到，他的著作思想性很强。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就是我文章中引用了的，他在归国途中，在货轮上写《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》一文时写道：假如地球自转加速的话，亚洲站住了，东非西欧破裂了，美洲落伍了。我看了以后非常欣赏，非常激动，这些科学家都是有思想的，很有思想的人。真正的科学家即使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，他也是很正直的，正义感很强烈的。这样的人物，是有思想的。我现在写的李四光、陈景润、蔡希

陶、周培源，都是这样的人，是很有意思的。这样我就答应了，就写了。我感到《地质之光》写得比较枯燥，很枯燥，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人会喜欢它。我用了很多技术上的名词，但是很奇怪，人家还是很接受的，当然他讲地质学我不懂，但还是体会到一些东西的。我想它能站得住，还是因为有思想性。这有点吹了，讲话讲过头，大家指正。

到写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时，确实动了很多脑筋，主要是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。那就是从《马恩选集》第一卷《路易·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那里来的。我很想借这个机会宣传宣传，凡是从事宣传工作和文学工作的人，一定要学经典著作，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、毛主席的著作，一定要学。这些人都是新闻学的大师。马克思在自己办的报刊《莱茵报》、《新莱茵报》和给它撰稿的《纽约每日论坛报》，写了多少通讯，是报人呐！又是报纸总编辑，又是报纸特约通讯员，写了那么多的报刊文章。恩格斯也是一样，列宁也是在报上写文章，《真理报》有的一天、两天一篇，有的一段时间一篇。主席更不用说了，光是他写的新闻，我就找到了一本小册子，全是主席写的新闻汇编起来的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是报人，都是最了解报纸的，从简单的新闻报道一直到长篇论文，写了多少！

我现在说这个话说得比较放肆，我是学马克思文章的。我有两句诗：诗崇毛主席，文拜马克思。我说这个话好象有点不害臊，不过我是这样想的，就这样说。我写文章就是学马克思的，不管我及不到他，离他老远老远，我还是学他，我要学他的文笔，学他的那些方法，所有的散文，我现在感觉到马克思第一。毛主席，我们现在中国人民的语言，主要

是毛主席的语言，我们日常谈的，讨论问题，思考问题，我们用的是毛主席的语言，毛主席是语言大师。但是，主席既然在诗歌领域达到了这样高的高度，我就诗崇毛主席。文章我是崇拜马克思的。这话听起来是狂妄的。不过我还是要讲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就爱读马克思的文章，有的时候简直是陶醉的，文章写得这样漂亮，散文写得这样漂亮。抄了一段，《资本论》第八章“劳动日”第三段：“没有法律限制剥削的英国各产业”，写道：“关于延长劳动日的冲动，以及狼一样的对剩余劳动的贪欲，我们只不过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考察，在这个范围内，便有无限制的榨取，照一个英国无产阶级经济学者说来，纵然和西班牙人虐待美洲红人的残暴行为相比，它也无不及之处。”这个语言是非常生动的，很感人的文字。我到处宣传，大家都读一读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八章第三段，开始往下念，非常动人，全是活生生的图画，全是小故事，全是眼泪，鲜血淋漓，感人至至，而且从中学习到怎么样写报道，怎么样写新闻，怎么样写报告文学，我就是从这儿学的。

我有意识地学习马、恩、列、斯的文章，除了学理论，还学他们的文字。对毛主席著作也是这样的，除了学他的理论，不可能学不到他的语言。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，做新闻工作，文字工作，一定要在经典著作上下功夫，除学习他们的文笔，包括构思、细节之外，更重要的他还给你一种力量。学了经典著作，我感到有一种力量。我是充满信心的，非常乐观，我们的远景使我神往。为什么能够这样呢？我还是觉得，力量的源泉还是从经典著作中来。有个机会，我就宣传这个。如果学了列宁呢，简直坐不住，就想起

来有个什么行动似的。学了马恩，就觉得什么事情都非常清楚，哪有什么胡里胡涂的，都是非常清楚的。毛主席著作更亲切了。我总感觉我们著作界、出版界在这一点上是走得慢了。主席五卷现在出来了，后面还有一大堆，那么多的财富，人民最宝贵的，还没有出来。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，文化大革命中也传出来一些。但是还没有公开出版，传抄的总是要有些错误。我倒是看了一本日本出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，十本，四九年以前的，只要有根据的，刊物上、解放区出版的集子，都收进去了。而且做了非常好的编辑工作，某一个文件，《毛选》里有的，同原来的有什么差别？主席怎么改的？都作得很好，日本人七六年搞的。我们的全集能不能早一点出来？我确实觉得学习经典著作——马恩的和毛主席的非常解渴，斯大林的可能看得少一点。原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，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读了几本书，感觉到非常解渴。

我现在算是写了两个文章，我自己觉得这些文章群众比较喜欢，首先是因为它们比我过去的作品强了一点，主要是在思想上比以前的好，比以前的强了。写《地质之光》时，是从李四光著作中感觉到思想的力量，大量地引用了李四光有思想性的语言。写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时，首先《人民文学》打了电话给我，要我去写陈景润。我当时就摇摆，写不写？给我家里人讲，家里人讲：“哦，这个人你写他干什么？”然后湖北文联的同志讲，这个人不好写，你要考虑考虑。我呢，先到北京看看。到北京以后，头天晚上，在我姐姐家吃饭时，桌子上人很多，当时就是一场辩论：究竟能不能写这个人？有人说他就是走白专道路嘛。什么是白专道路？然后

就连续不断地考虑这个问题，能不能写这个人。还有些好朋友，很好的同志，专门写信来，劝我不要写，说这是个是非之地，是非之人。一片反对的声音，直到我到了数学研究所，在食堂吃饭，对面有一个女同志。她说：“没有看见过你，哪来的呀？”我说：“我是《人民文学》的。”“那你是来采访的吧？”我说：“是！”“写谁呀？”“写陈景润。”她说：“哎呀，你还是写杨乐、张广厚吧，不要去写陈景润了。”我也请教了一个老同志。我问他：能不能写这个人？他说：写陈氏定理了不得！我说：好，你怎么讲，我就写。然后开始摸材料。整个过程是有斗争的。就是要从思想上来肯定陈景润。你敢不敢肯定这个人。经过很大的一个思考过程。到数学研究所去了以后，我还是读了许多书的，读了马克思的《数学手稿》，根本读不懂。但是，马克思的《数学手稿》同其他的数学手稿不一样，他写了许多文字说明，而且这些文字说明运用了社会科学的语言，把X、Y……讲得非常有趣。原来前面那个扉语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，后来有人不同意，就没有用，就用了元旦社论中的一句话，非常好，我就改了。

我写《地质之光》的时候，枕头边上放着列宁的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第五册，就是关于自然科学的。我反复地看，每天晚上都要看一看，看看怎么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，怎么处理自然科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问题。每天晚上都看，我看了一个月，虽然没有直接用处，但每天都看一看，每翻一次都感到亲切一点。所以这个理论，恐怕是离不开的。一日三餐还要加精神上的一餐，加一餐理论餐。强调这个东西，我现在能写一点东西，主要是这方面

给了我帮助。理论我先讲这一点，回过头来还要讲。

二

其次是生活。生活这一关我也是很差的。知识分子没有经过劳动的生活，都是后来补课补上去的。长期脱离劳动，生活关我是根本没有过的。我是到处跑的，跟许多作家相比，我很差劲。我跑是跑得厉害，开国以后，在国会街工作的时候，我就要求跑。这，老同志都知道的。呆得最长的地方，只三个月，后来有呆过一年的，在一个点里也有呆一年半的。一般都是两个礼拜、一个月。那时在《人民中国》作记者，好象也还过得去，甘于这种状况，没有能够很深入的到生活里面去，长期蹲点。我们湖北有个作家叫黄君野，他在丹江水利工程二十年了，始终没有离开那个地方。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回到丹江口去的时候，陪他去的人看了都很奇怪：丹江工人、领导干部，一知道黄君野要来，两三百人到火车站去等他。他在那个地方生活的根扎的深。他写了很好的作品，不久就要出版。湖北有个工人诗人叫黄声笑，他的生活基础非常雄厚，从小是搞劳动生产长大的，即使到现在，都是有生活的。我是到处转。比方说，一九五六年，我作为《人民日报》特约记者，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，到武钢工地，然后到长江水利委员会。到了重庆，到都江堰，以后沿着岷江，看了水利坝，然后到重庆市，又到昆明看少数民族。就这么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看，这么转，然后坐飞机到兰州去了，到了玉门、玉门油矿，到敦煌、千佛洞，看美术，然后到柴达木盆地，……又到兰州，这么一绕，绕了个

大圈子，是很不深入的。不过呢，也看了不少东西就是了。我这种生活方法，并不是很好的，不过作为新闻记者也还是可以的。我现在是写报告文学的，其它的艺术形式、文学形式，我都不大想搞，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，根本不敢想，想也不敢想。就写两万字的报告文学。生活是很重要的，有了理论就指导你去生活。熟悉一大群的人，熟悉各种人物，各个阶级。

毛主席要求我们熟悉整个社会，一切阶级、一切人、一切社会斗争形式，这是要从生活中去感受，是要下功夫的，要下很大的功夫。记者要写出很好的报道来，要有生活，要熟悉生活，要能够分析生活。分析生活也要靠理论，这个我比较差，但是有一条，我肯跑，只要一有机会让我跑，那是最大的欢乐。真是想跑，到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或者已经去过的地方，再去一次，只要能够出差，我第一个报名。有这么一种要求，很想到外面去，现在也是想到哪里去、哪里去，充满了幻想，不过不是幻想，常常是能够实现的。就想跑，现在是跑不过来，想再到云南去一次。上次去的时间很短，有好多东西摆在面前，没有时间去搞。又想到云南去，又想到河西走廊去，二十年没有去了。又想到新疆去一下，过去没有去过南疆。又想到海上去，到北部湾，看海上钻探，还想到渤海湾去，就是想出去，所以我在这里宣扬一下。当然，有好多同志做编辑工作，不一定能够经常出去，但一年有两三个月出去转一下，总不能老坐在家里，要出去。我现在能够写一点东西，就是得力于能够出去跑。到外面采访的同志机会多些。编辑同志也要适当的接触一下生活，搞新闻报道的就是要往外跑。我在湖北，他们批判我是

“满天飞”。我在日记上写过一句：我也算是飞天罗！他们就说我是飞天。“把翅膀砍掉它！不许他飞天，叫他到一个点里蹲下去。”这当然是好意。关于生活大体上这样讲一下，就是要到生活中去。过去讲过，不要住在墙圈里头，不要住在城墙里头。要出来，要出门去，要出城去，要到生活中去，要到沸腾的生活中去。

三

关于语言。语言这两个字，近来很少人讲了，一般都是说用“文字”。文化大革命之前，在文联，我们是经常讲语言的。语言与文字是有分工的，语言是口头上的，文字是印刷在纸上的，它是固定的，语言是不固定的，也是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。如果能够记录下生动的语言，能够提炼最生动的语言，那么你写的东西可能是比较好的。但是，你不要从文字去学文字，你只能从语言学文字。什么是文学，文学就是语言。这个话现在很少人讲，语言这东西人家不大谈。我们国家有几个语言大师。一个是曹雪芹——《红楼梦》的作者，他在二百多年前所记录的当时的北京话，你现来看一看，还是最生动的北京话，最生动的北京语言。曹雪芹文章里是两种都有，一种是文字的，那文字是很高明的，四个字、四个字这样写下来，恐怕到现在不一定有哪位作家赶得上。

毛主席对《红楼梦》评价之高，是跟我国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、资源丰富相提并论的。毛主席说，我们国家有四个了不起的东西，一是地大物博，一是人口众多，一是历史悠

久，还有一个，在文学上有部《红楼梦》，《十大关系》里头讲的。也就是说，《红楼梦》象一面镜子，把我们国家的历史悠久、物产丰富都反映出来了。《红楼梦》最了不起的就是它的语言，这个语言里头带来了《红楼梦》的阶级斗争，而且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斗争，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。它是资本主义带路人，这一点是列宁讲过的。这一点过去有人讲过，现在也没有人讲了。《红楼梦》是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嘛。现在人家都讲，《红楼梦》是封建社会没落的镜子，这叫半个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是资本主义宣言书。《红楼梦》就是说：资本主义快要来了。通过《红楼梦》，贾宝玉、晴雯、还包括袭儿、林黛玉说出来的。《红楼梦》就是这样一个书嘛。然后说封建社会要衰亡了。《红楼梦》的语言可以翻一翻，一些主要的女奴隶的语言，看一看，简直是第一个语言大师。

其次就是鲁迅，罗《鲁迅全集》可以去翻一翻呐，那语言真是丰富。但是鲁迅在接受外来语言的时候，搞了五百万字的翻译，他翻译的东西有十本。他把外来语言变成我们中国自己的语言，是花了很大力气的，但他没有完成，是主席完成的。看一看鲁迅的语言，那是很了不得的，找不到一点毛病。我这篇文章，有一个读者、一个语文教师批评我的文章，这些都是批我的文章（示批件）的，所以我的文章毛病很多。我有时还犯语法上的错误，连一个付词和形容词也搞不清楚，什么“地”、什么“的”，都搞不清楚，都马马虎虎过去了。你去查一查鲁迅的语言，没有一点毛病，精密到了极点。锻炼文字、锻炼语言是个很大的功夫。鲁迅的文字，看得你笑破肚皮。能够掌握笑的艺术也是了不得的，所

以侯宝林大家那么喜欢他，是我们最好的笑的艺术家的。

然后就是毛主席。我们现在的文字、写的东西，有个来源，我来看去，我们所有的中国人，写中国文字的时候，是从毛主席那儿来的。毛主席语言的精炼、准确，精采，你打开《毛选》来看看，都能看到的。毛主席也是一个使看了他的文章的人能够含笑、笑起来的，很幽默的那么一个大作家。毛主席的语言好极了，我们现在的语言都是从他那儿来的。看看鲁迅的翻译，再比比毛主席的语言，就看出来了。毛主席是发展了鲁迅的语言，是把鲁迅所没有完成的、在那里努力探索的事完成了。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字确实很完美，从曹雪芹到鲁迅，然后到毛主席。当然，我们不能说它是文字，它是语言，是活的。我是学马克思语言的，很难懂，有时一句句子很不容易懂似的，然而马克思的语言最完整、最准确。那么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呢？从陈望道的第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到现在我们的马列著作翻译文字，进步了。现在翻译的真好，完全能把马恩的原意译过来，改了一版又一版。主要是毛主席摆了一个典范在那个地方，是用了毛主席所完成的那种语言来翻译的，都比较好读了。我们现在很幸福，有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运载工具，有了毛主席的语言，它是限制你的，毛主席语言的风格是不限制你的，你能够自由运用它。主席讲过，一个是劳动人民的语言，一个是中国古代的语言、中国古代还有生命力的语言。这个也是我写东西经常用的，四个字一句。四个字一句，从中国的语言上是到家了，很精采。还有外国的语言，你要看《毛选》，毛主席就是这样写的，有时一大串的形容词、形容句，主语还没有出来，到最后才出来。外国的语言，中国古代的语

言，劳动人民的语言，熔于一炉，是毛主席语言的长处，都是生动活泼的。我们现在写的文章枯燥的、干巴巴的，毛主席的语言从来没有哪个地方枯燥过，总是生动的。

我这次写李四光时，用了大量外国的语言，大量用了英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四光开国以前写的地质学的论文都是用英文写的，他的英文好，中文也好。但是，他写的地质学的论文是给世界看的，他是用英文写的。就是说有那么一段，他想好了要写出一篇文章来，“展示印度作为一个次大陆，如何在整个地质的时期，曾坚强地承受了从古海域兴起的强烈的构造风暴的袭击”，这是李四光的原文。李四光原来是用英文写，后来他自己翻成中文，我是照抄的。象这样的句子，要用外国文法分析法划起来，也是很复杂的。本来是英语，我照原文拿过来，不能他写英文我写中文。为了便于文字统一，我写时也用英文。因为我翻译过很多东西，我搞过翻译，我也能象外国人一样说话，那么喜欢用倒装句。我用英文来写，和李四光的原来是英文后来翻成中文的距离不致于太大。这是洋里洋气的，这个《地质之光》现在来看还是洋里洋气的。奇怪得很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读者还是爱读的。当然我还是尽量搞的不太洋里洋气。因此我也修改，写时用英文，写完了后再改成通顺的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这里大量的语言，前面这四段，几乎都是外国的文法，外国的句子结构，然而还是被一般的读者接受了。可见要是语言带来了形象和思想，语言本身结构的阻碍并不太大。如果一种语言把你所希望描写的形象，所希望写的思想把它运载过来的话，读者是能接受的。

《地质之光》在最后一段里，内容不同了，用了一点古